

“敦煌人”——“莫高精神”的主体

■ 柴剑虹

习近平总书记甘肃考察时,在与敦煌研究院的座谈中指出:“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这段话明确了秉承“莫高精神”的主体,是“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近40年来,由于本人治学的专业需求、爱好与敦煌莫高窟的因缘际会,遂有幸结成了与莫高窟五代“掌门人”及众多“莫高窟人”的缘分,故撰写这篇短文略叙我对“敦煌人”的一些感受。

70多年前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常书鸿先生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的事迹为世人瞩目、敬仰,国内外介绍文字甚多,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论述,此不赘述。常先生最早是在巴黎塞纳河畔书摊的画册中知道敦煌莫高窟,然后发愿回国来进行这个艺术宝库的保护、研究工作的。

近30年来,我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十余次,几乎每次都要去看看塞纳河畔的书摊,浏览之际,脑海里往往会涌现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让这位在西方艺术之都已有成名基础和“资本”的杭州前辈老前辈,毅然决然去坚守条件十分艰苦的大漠荒原?常先生晚年时,我曾多次与他用乡音作短暂的交谈,那时他虽然已经因患病记不清眼前的人与事,却对在莫高窟40年的奋斗经历记忆犹新。记得他在北京寓所对我常说的两句话是:“敦煌的画儿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贝,我们有责任保护好!”“有时间我还是回敦煌去的!”

1983年夏天,在兰州的敦煌学术研讨会结束后,我和常老同乘一趟火车去敦煌,看着车窗外闪过的黄沙戈壁,他动情地用标准的杭州话跟我说:“我老家在山清水秀的西湖边,鸣沙山、莫高窟也是我的家,只要到家了我就莫佬佬高兴哦!”视大漠为家乡,数国宝如家珍,发愿一心坚守,甘为之奉献一生,毫不动摇,这正是“莫高精神”的核心啊!

段文杰先生是莫高窟的第二位“掌门人”,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我也曾写过几篇文章谈及他对我的教诲与启迪,称之为“敦煌圣徒”。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引进敦煌学专业人才以及培养后继人才的热诚与渴求,这一点,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同仁们当有许多切身体会。

20世纪80年代初,他引进了曾蒙受不公待遇的李正宇、谭焯雪、汪泛舟等几位学者。其时,从全国征聘的人员还有郑念祖、梁尉英、杨汉璋等多位学者。



柴剑虹 CHAI JIANHONG

1983年夏天,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历史系罗华庆、四川大学历史系宁强大学毕业后主动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段先生抓住典型,予以鼓励,进行宣传,扩大影响。第二年,赵声良、王惠民、杨森等大学毕业生也进所工作。这些举措,不但迅速提升了敦煌研究院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为院里的年轻人竖立了好榜样。

1987年春末夏初,我和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几位同事到敦煌,为与敦煌研究院合办“敦煌学专号”组稿,段先生不仅带头为专号撰写了3篇文章,还动员其他研究人员投稿,而且决定增加刊量数量,使这个专号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多的学术普及刊物。

我最近找出了他1994年2月6日给我的信,中心内容是诚恳地邀请我到敦煌研究院担任业务领导,“要把敦煌学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当时,他还特意请樊锦诗副院长出差北京时到中华书局来转达他的邀请口信。我知道段先生也曾向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和北大的荣新江两位教授发出了同样的邀请。鉴于各种原因,我们都未能满足他的愿望。

之后,为了办好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他将赵声良派到中华书局我负责的《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了半年多时间,为建设优秀的人才梯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清楚地知道,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敦煌研究院建成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研究当之无愧的一个中心。

樊锦诗研究员是莫高窟的第三位“掌门人”。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出身的江南才女,牢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一发自内心的誓言,克服了和夫君、孩子多年多地分居的艰难,坚守莫高窟58年,为敦煌石窟瑰宝的保护及文化艺术的传承、弘扬做

出了杰出贡献。记得1982年我第一次参观、考察莫高窟,就是樊院长亲自导引、讲解、启蒙的。当我得知她祖籍也是杭州时,不禁暗暗为敦煌与我家乡的历史文化渊源而兴奋不已。后来,因为她是在沪地上学长大的,有记者发表文章称她为“上海的女儿”,却并未得到学界和她本人的首肯,因为她就是“敦煌的女儿”——她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和大半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事业。

在和她多年的交往中,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无论外界环境的顺、逆如何变化(包括旅游氛围、领导旨意、舆论褒贬),她心系敦煌文物保护始终不渝。诚如她在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所说:“此生宿命,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书中所突显的一颗心、一件事、一辈子,就是热爱祖国文化事业的赤子初心,是保护莫高窟文物的在肩使命。

我和莫高窟第四位“掌门人”王旭东院长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位在甘肃本土成长,一直默默无闻从事着石窟保护的博士,让我最为钦佩的就是待人宽厚而学问扎实、办事严谨,讲求真干实效。他上任伊始,就一再强调要立足敦煌放眼世界,要促进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的国内、国际交流合作,不满足现状,要有开拓进取之心。凡是年轻学人为提高业务水平想尝试去做的事,他都乐于为他们创造条件,予以扶持。前几年我和他一道参加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会理事会时,每次听他发表意见,都因他的出于公心、坚持公道而得到启迪。他上任后,又勇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也特别尊重敦煌研究院已经退休的

老专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他担任院长的几年中,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继续脚踏实地地向新的台阶迈进。

敦煌研究院新的“掌门人”赵声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是我的校友、系友。我与他因1984年他本科毕业时我支持他下决心赴敦煌工作而相交至今。这位云南昭通人和敦煌的因缘,36年间扎根敦煌、勤奋学习和工作的成长经历,虽平凡却动人。对此,他已撰有专书、专文细述,无须我再条分缕析。

他在日本以勤工俭学的方式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几年里,我们曾有多封书信往来。他每封信的中心内容,几乎都是诉说他学成回国后要继续扎根莫高窟、从事敦煌美术研究的决心。事实证明,他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他对艺术史研究的执着,对敦煌文物的珍惜,对研究院繁杂事务的勇于担当,对宣传、普及敦煌文化艺术工作的热诚,应该成为今天年轻学人仿效的榜样。

几年前,在为纪念段文杰先生百年诞辰举行的国际敦煌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敦煌守护众神与丝路之魂》的文章,特别强调,70年来,一批又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莫高窟人”,堪称“敦煌守护众神”,有了他们,才能够将“交流互鉴、交融创新”的丝路之魂演化成有强大生命力的、为当代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造福的精神营养与物质财富。

我想起了研究院退休的施萍婷所长写的一篇题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的文章。她也是我的浙江老乡,这位前志愿军战士,和她夫君贺哲哲归国继续深造,之后就一起投身于莫高窟文物的研究事业,倾心奉献,毫不动摇。我也想起了曾或多或少接触过的史苇湘、李其琼、关友惠、孙儒儒、李最雄等研究院多位老专家,他们对敦煌事业的赤诚可感天地。

我还回顾了和张先堂、张元林、姜婕、李萍、王志鹏、陈菊霞、张小刚、陈海涛等一批中青年同仁相互切磋的难忘事例,他们已成为敦煌学研究开拓创新的生力军。

我希望借此说明:从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70多年来,一批接着一批奋斗在鸣沙山崖、宕泉河畔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众多经受千辛万苦却始终对莫高窟魂牵梦绕、挚爱不渝、“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他们堪称创建我国文物保护重镇、护卫“丝路之魂”的“守护众神”,也是弘扬“莫高精神”、夯筑世界敦煌学研究新高地的奠基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

蒋子龙: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发表的

■ 李婕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改革文学”作家代表蒋子龙在大会上受到表彰,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5个月后,在春光熠熠的兰州,蒋子龙先生受邀在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大讲堂做了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让我们顺着改革的脉落,沿着文学的流动,一起走入作家蒋子龙的内心世界。

“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

“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在《甘肃文艺》上发表的,甘肃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说起甘肃,向来不苟言笑的蒋子龙,话匣子便哗地一下打开了。

1960年,经过严格考试,19岁的蒋子龙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海军制图学校,成了一名光荣的海军绘图员,加入中国海图和世界海图的绘制序列。

峥嵘激荡的军旅生活,使年轻的蒋子龙养成了强烈的责任意识,祖国的投影早已在他的生命中深刻撰写,高贵的爱国情感在他胸中积蓄燃烧。

军装下亦有绕指柔,年轻浪漫的蒋子龙喜欢写故事。怀揣着对西部山川大河的热爱,在甘肃籍战友的建议下,他尝试着将小说《新站长》投给了西部刊物《甘肃文艺》,一个多月后,文章得以正式刊登。这是蒋子龙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与甘肃这片土地深厚缘分的起点。

几年后,蒋子龙复员,怀揣着一身测绘专长,他渴望浏览祖国大好河山,他想投身西部建设,去新疆天山勘测大队当测绘员。然而,就在火车途经兰州时,一个意外发生了。

由于长达几十小时的长途奔波,过于劳累的蒋子龙躺在候车室的长凳子上睡着了,直到有小偷脱他的鞋才被惊醒,待他坐起来,一只胶鞋已被偷走,另一只脱了一半儿,头下枕的文件包也被小偷全部偷走。

他穿着海军军装,赤着一只脚找到派出所,派出所把他送到了兰州军人安置办公室。蒋子龙清晰地记得,办公室有一个叫老胡的负责人接待了他。

“老胡很朴实,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我在他那儿吃了午饭,还在小床上睡了一觉,下午他把我送到车站,帮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到列车长,让我给我管三顿饭。要是没有老胡,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现在我都一直很感谢他!”蒋子龙说。

每个作家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编辑,尤其是发表他不会忘记的作品的编辑,而以前的刊物是不署编辑姓名的。带着敬意、谢意和好奇,蒋子龙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千里之外的那位“伯乐”。

1993年8月10日,蒋子龙参加敦煌笔会途经兰州,终于见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位编辑——时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家达,两人相见恨晚,互诉着推开了近30年的“西部情结”。他也一直在寻找老胡,还专门



李婕 LI JIE



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兰州大学文学院。曾就职于中共甘肃省委《党的建设》杂志社,公开发表党刊文章30余篇,数次荣获全国党刊优秀稿件(文字类)二等奖、全国党刊优秀稿件(美术类)二等奖,作品《匠心躬耕在沙漠》先后在学习强国APP、《光明日报》《读者》等媒体转载刊登。

写了篇题为《寻找老胡》的文章,但一直都没有找到。

人生不是止水,总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对于蒋子龙来说,当初如果好好上“锻铸技工学校”,他可以当大工匠、技师甚或厂长;倘若选择留在部队,好好干的话可以当军官,升到团级、师级;如果没有兰州站发生的小插曲,也可能已经在新疆天山脚下开始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岁月如水,沉淀下来的,有那雄阔奇崛的高原天空、苍凉郁勃的黄河水浪,还有那割舍不掉的甘肃情缘。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

一个作家要找到人物,就要先找到他自己。好的人生需要文火慢炖、细水长流,好的作品更是需要作家把自己整个的心灵、把全部人格、把从生活中得来的所有经验都摊开来,投注到现实思考中去,融汇于笔端纸墨间。

纵观蒋子龙的文学作品,基本都取材自真实鲜活的产业活动。作为一名书写者,他秉承着对生活执着的热情,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刻画着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争搏、人生变幻。

1975年秋天,全国“工业学大庆”,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的会场上,《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找到了蒋子龙并告诉他,毛主席亲自下令要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在1976年复刊。编辑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人民文学》写一篇小说。

《人民文学》是文学领域的“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的文学圣地,能让《人民文学》约稿该是多大的一桩喜事!蒋子龙热情满满,干劲十足,满肚子都是想要倾吐的话,于是,就在开会的宾馆里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由此有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诞生。

三年后,1979年,蒋子龙又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的影响更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也使“蒋子龙”这三个字从

此路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文革”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涣散,老干部乔光朴主动站出来收拾烂摊子,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

“如果我是厂长,我会这么干!”在这篇当时风靡全国的文章里,蒋子龙融入了自己对产业文学的前沿思考,那是他内心最为深刻的剖白。

小说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轰动。兰州一家石化厂厂长拿着刊发这篇小说的《人民文学》第7期,以此为据对工厂进行改革整治;沈阳一位护士给蒋子龙写了7页长信讲“乔厂长”对她父亲的影响,帮助她父亲走出抑郁,重新拥抱新生活;甚至还有报纸文章以《欢迎“乔厂长”来上任》为新闻题目,有地方干部邀请“乔厂长”来当地主持企业生产工作……

蒋子龙在笔触间努力使现实更接近真实,沉稳自信、厚实雄劲。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相联系,便产生了产业文学的美。

他站在当代工业文明的最前沿,勇于直面某些现代人对工业文明的恐惧,反映现代科技潮流中人的历史命运。蒋子龙的文学沉得住气,找回了平静的自信,才会有所作为。正所谓,心收静里寻真乐,眼放空处得大观。

之后,蒋子龙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井喷式创作出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等一大批工业题材小说,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由此,他也被贴上改革文学缔造者和工业题材代表作家的标签。

直至近年,蒋子龙依然执着于对现实生活孜孜不倦的探索 and 发现。《农民帝国》是他从工业题材创作领域转移到农业题材方面的一部重大经典之作。小说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绘了以郭存先为代表的农民群像,细腻而深刻地揭露了“农民性”和“工业性”之间的冲突,给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一路走来的奋斗者以强

烈的情感冲撞和深刻的思考。

日月忽其不淹。作为“改革文学”代表作家,蒋子龙始终用他充沛丰盈的灵魄开采用多维的生活资源。在他看来,只有当“改革”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剧烈地激荡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不是我选择了改革,是改革选择了我。”蒋子龙始终奋斗在探求精神尊严的文学创作道路上。

“守心定魂,讲好自己的故事”

回首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蒋子龙把自己对文学世界的贡献归结为创造了“三个模式”:一个是大胆、改革、用人的“乔厂长模式”;一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玩世不恭、有想法、关键时刻能顶得上去的“刘思佳模式”;另一个就是《农民帝国》里的“郭存先模式”。这些特征鲜明的人物形象,一度引起了文学影视界的竞相借鉴,有些人物类型至今依然生动鲜活。

在《乔厂长上任记》发表40多年后的今天,蒋子龙先生与我们分享了这部作品对于当下的现实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下过时了。”他坦然剖析,“如果说还有意义的话,它只存在于文学层面上,就是我创造了‘乔厂长’模式——大胆、改革、用人。‘乔厂长’出来以后,当时好多小说主人公的人格都是这个类型的,突然冒出的一个‘乔厂长’形成了社会的公共记忆。”

诚然,“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生命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相承。故事注定会因时而变,但始终不变的,是讲好故事的能力。

在题为《文化的精变》的讲座中,蒋子龙先生说,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故事,而故事就在基层、在普通大众中。文化育人,内化于心,外化于社会,文化的最大力量在于“化”。“文化精变”最显著的特点在于有话不好好说,社会碎片化,语言文明急剧退化,在应对“文化精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定住自己的灵魂,刻苦做事,讲好自己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贵在追求真理,尊重伦理。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俭约自守、中正泰和的生活理念等。无数优秀的思想理念滋养了中华民族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至今仍然发挥着深刻影响。

编筐编篓,贵在收口,讲好故事,或许我们应该做场“反序运动”,从优秀文化中回归生命的本真、提炼人生的精华,看破所谓“妙招”的诱惑,守心定魂,落下平凡的一子。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第八辑)